

明清至二十世纪前期广西百色茶叶历史与文化研究

左宜玄, 杜国明*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4日

摘要

本文基于地方志、近代文献及科技史研究资料, 对广西百色地区茶叶的历史演变及相关文化融合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研究聚焦于以凌云白毫茶为代表的百色茶叶, 在明朝至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整体发展脉络。百色地处桂、滇、黔交界及茶马古道沿线, 其核心产区凌云县独特的自然环境, 为茶树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本研究从历史地理及社会文化史视角, 勾勒了百色茶叶从野生利用、贡品经济到现代品种认定的历史演化过程, 同时揭示了茶叶作为一种当地物产, 在推动当地多民族文化交融与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持续性作用。

关键词

茶文化, 地方史, 传统文化, 广西百色

A Study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ea in Baise, Guangxi: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Yixuan Zuo, Guoming D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February 26, 2026; accepted: March 24, 2026; published: April 24, 2026

Abstract

Based on local gazetteers, modern documents, and research materials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通讯作者。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ea in the Baise region of Guangxi.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Baise tea, represented by Lingyun Baihao Tea,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mid-20th century. Baise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Guangxi, Yunnan, and Guizhou, along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The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its core production area, Lingyun County, provides optimal conditions for tea tree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social-cultural history,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Baise tea from wild utilization and tribute economy to modern varietal recognition. Simultaneously, it reveals the enduring role of tea as a local product in promoting multi-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life in the region.

Keywords

Tea Culture, Local History, Traditional Culture, Baise, Guangx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学术史回顾与意义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1]。”茶作为起源于中国南方的古老饮品，其种植、利用与传播的历史，不仅是农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透视地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的一扇窗口。广西百色地区，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其茶叶种植与利用的历史源远流长。以凌云白毫茶为代表的百色茶叶，据史料记载已有千年以上的发展历程，从侧面映射了我国边疆地区农业开发、商品流通与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

关于广西百色地区，尤其是以凌云白毫茶为代表的茶叶研究，现有成果多聚焦于凌云白毫茶的生物学研究及旅游业相关研究。总体而言，系统的、基于历史文献的地方茶叶史研究尚属薄弱环节，学术关注点多集中于现代农学与产业经济范畴。

针对百色茶叶，尤其是凌云白毫茶的专门性历史研究则较为稀少，仍有空白等待研究成果填补。在已有研究中，百色茶叶虽偶被提及，但多作为物产列举或经济活动的细枝末节，缺乏将其置于长时段地方社会变迁脉络中进行的深入、连贯的专题考察。其千年以上的利用历史，目前主要依赖方志中的片段记载和地方传说，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系统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茶马古道”研究的兴起，西南地区的茶叶贸易与文化交流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格勒对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这条古道不仅是经贸之道，更是联结内地与边疆的重要通道，促进了各民族交往、融合[2]。任新建则进一步细化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追溯至汉代的“旄牛道”，并强调了川藏道在茶马贸易中的核心地位[3]。石硕从考古学视角指出，茶马古道的前身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是远比茶马贸易更为古老的文明孔道，其历史文化价值在于它是汉藏民族交往的象征与纽带[4]。张永国则从宏观角度梳理了茶马贸易从唐至清的兴衰历程，归纳其历史价值为黄金旅游之路、文明传播古道等多个维度[5]。陈保亚从语言学与人类古地理角度论证了茶马古道的起源，认为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是促成其形成的关键[6]。张海超的研究虽聚焦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滇茶贸易，但揭示出以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早已将云南与吐蕃及东南亚紧密相连[7]。值得注意的是，《广西茶马古道——德保古道》一文以实地考察为基础，明确指出广西百色的德保地区存在一段保存完好的古

道,是连接广西田东横山寨(宋代重要马市)至云南、大理,进而延伸至缅甸、印度的茶马古道东线[8]。这一发现打破了茶马古道仅存在于川滇藏的固有认知,为研究广西在西南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地理坐标。然而,现有茶马古道研究多以川、滇、藏为核心,对广西段古道的关注才刚刚起步,百色茶叶与这条古道之间的具体关联仍有待深入挖掘。

在区域茶业史研究方面,李民的硕士学位论文《历史时期广西茶业研究》是目前为数不多对广西茶业进行通史性梳理的成果。该文从自然环境和茶树原种入手,详细论述了广西茶业从战国至隋朝的萌芽、唐五代的兴盛、宋代的繁荣到明清鼎盛的完整演变过程,并对恭城、象州、容县等产区的生产演变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区内参照[9]。然而,该研究覆盖全省,虽提及百色,但着墨有限,未能对百色这一关键区域的茶叶历史展开专题论述。

将茶视为一种融合了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符号”,是近年来茶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蒋文中等通过对云南民族茶文化的研究,指出茶马古道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各民族在长期的用茶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俗、茶艺与茶道,其中蕴含的和谐之美对边疆民族关系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0]。赵润恋从民族学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少数民族以茶为食、以茶为礼、以茶为药、以茶事神的多元文化现象,探讨了茶在人生礼仪、文学艺术中的符号意义,揭示了茶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和精神遗产的深层价值[11]。这些研究将茶从单纯的“经济作物”提升为解读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的“物证”,为本研究分析百色地区茶叶在待客、婚聘、祭祀等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功能,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借鉴。

近年来,茶马古道研究在范式上亦有重要突破。刘礼堂、冯新悦对西南茶马古道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反思,指出既往研究存在“不够系统规范、在地域和时段上出现断裂、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壁垒”等问题,提出应以“一带一路”的新视野、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以文献整理为核心多学科综合的新方法,推动古道研究的跨越式发展[12]。刘礼堂进一步提出“川滇藏框架”的概念,认为西南地区先经局部整合形成川、滇、藏三个较大区域,后通过茶马古道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打破这一框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藏彝走廊地区的民族关系也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体现了古道对多民族交融的深刻影响[13]。这些研究为本文考察百色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地带的地理区位及其在茶马古道网络中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从宏观的茶叶贸易史来看,清代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最为关键的时期。陶德臣将清代茶叶外贸划分为初起、发展、繁荣、衰落四个阶段,系统分析了各阶段的市场格局与贸易特点,指出18世纪中叶以后以红茶为主的贸易格局对国内红茶产区的扩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4]。康健则以全球视野考察祁门红茶的诞生,揭示了红茶制造技术从福建武夷山地区向北传播至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的完整脉络,并指出祁门红茶的创制“正是为应对世界茶叶市场中红茶贸易、红茶消费为主的新格局应运而生”[15]。这些研究表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红茶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为理解同一时期百色茶叶(以凌云白毫茶为代表)在区域贸易中的地位提供了宏观背景。

综上,学术史现状表明,尽管西南茶史、茶马古道及民族茶文化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聚焦于广西百色这一特定区域的茶叶专门性历史研究仍属薄弱环节。与百色茶叶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虽已存在,但长期处于零散、未被系统整理与解读的状态。明清至二十世纪前期繁修的多部《广西通志》《镇安府志》《凌云县志》等地方志中,蕴藏着关于茶叶产地、性状、贡赋、贸易、税课及饮用习俗的珍贵记录。然而,在现有学术产出中,未见有研究者对这些散布于“物产”、“风俗”、“赋役”、“艺文”等门类中的史料进行专门梳理与辑录,导致这一重要的物质文化史料宝库未能被充分打开。

综上,学术史现状表明,一项以历史时期为核心、以地方文献为基础、将茶叶视为融合经济生产与社会文化之整体对象的系统性研究,对于填补百色区域史研究的空白、深化对中国西南边疆物质文化史的理解,具有显而易见的学术价值。从科学技术史的视角审视百色茶叶的发展,其价值在于系统地考察

这一地方特色作物在特定地理与人文环境中, 所经历的完整演变。这包括茶叶如何从一种植物资源, 逐步融入地方经济贸易、日常生活礼仪、婚丧嫁娶习俗乃至民族认同之中, 成为一种体现当地文化的鲜明符号。本研究即旨在通过系统整理与解读方志史料, 尝试勾勒百色茶叶与茶文化从明清至二十世纪初的发展轨迹, 并将其置于茶马古道(广西段)的区域贸易网络及多民族社会文化互动的宏观背景下, 揭示其独特性与历史意义。

1.2. 百色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百色市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 位于云南高原东南缘, 东邻南宁, 西接云南文山, 北连贵州黔西南, 南与越南接壤, 正处于桂、滇、黔三省(区)结合部。这一独特的地理区位, 使其历史上成为茶马古道等西南地区重要商路的必经之地, 为茶叶等物资的流通与贸易网络的构建提供了地理条件。

百色茶叶的核心产区集中于其下辖的凌云县。凌云县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麓, 境内山峦起伏, 地势高峻。该地气候温和, 四季云雾缭绕, 日照时间短而漫射光丰富, 昼夜温差显著。这种高海拔、多云雾、温差大的山区小气候, 极有利于茶树, 特别是白毫品种的生长与内含物质的积累, 为凌云白毫茶“色翠、香高、味浓、耐泡”的品质特征奠定了自然基础[16]。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 核心资料来源于历史方志文献。系统整理了明清至二十世纪前期编纂的与百色地区相关的地方志, 包括《广西通志》(嘉庆、光绪)、《镇安府志》(乾隆、光绪)、《凌云县志》(20世纪初)、《田西县志》(20世纪初)、《西林县志》(康熙、20世纪初)、《百色厅志》(光绪)等。这些方志在“物产”、“风俗”、“赋役”、“艺文”等门类中, 对当地茶叶的性状、产地、贸易、税赋、饮用习俗及文化功能均有零散却珍贵的记载, 构成了还原历史现场的基本史料。

2. 百色茶叶的发展历史

百色茶叶, 尤以凌云白毫茶为核心代表, 其有文字可考及系统化发展的历史, 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明朝的初步利用、清朝的规模化发展与贡品地位确立, 以及二十世纪前期的产业扩展。这一历程清晰展现了该地区茶叶从野生资源被发现、驯化利用, 逐步融入地方经济, 并最终获得国家层面品种认可的技术与经济发展轨迹。

2.1. 明朝: 起源与初步发展

凌云白毫茶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朝。根据方志记载与地方传说, 该品种系由野生茶树驯化而成。在凌云县的岑王老山、先锋岭等地, 至今仍保存有被视为其起源证据的野生古茶树。其利用历史最早的文字线索指向明朝中期。据载,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 东和乡白马村被西屯的先民在大石山开辟了有史以来第一块茶园, 种植茶树六百余株。这标志着凌云白毫茶从野生采集向人工栽培管理迈出了关键一步, 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7]。

关于该时期茶叶的性状, 虽无明代直接记载, 但后世文献对其品种特征的描述具有一致性参考价值。综合《广西通史》《广西通志稿》《广西特产物品志》等多部方志记载, 凌云白毫茶(史称“白毛茶”)的典型特征为: “嫩叶如银针, 老叶如龙眼叶而薄, 背有白色茸毛”。这一独特的植物学特征, 使其在众多地方品种中被清晰辨识与记录。

2.2. 清朝: 规模化与贡品化

进入清朝, 百色地区的茶叶生产进入了有明确方志记载的规模化与商业化阶段。首先, 产区得以明确记载与扩展。清代康熙年间的《西林县志》中详细描述了元宵节采茶的民间习俗“花篮灯簇, 采茶声

里又元宵”[18], 嘉庆年间编修的《广西通志》中则记载了“余出上林茶山……”[19], 这种百色地区茶叶产区的记录, 表明茶叶种植已成为当地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

茶叶的品质获得了官方认可, 成为上贡朝廷的方物之一。至迟在乾隆时期, 经过当地茶农系统培育的凌云白毫茶, 已凭借其优良性状成为上供朝廷的贡品。《镇安府志》中《赋役志》明确记载了“茶叶等物仍解京師”[20]。在方志的赋役章节中明确地记载了茶叶上供, 由此可见至少在乾隆时期, 百色所产的茶叶已经成为登记在册的贡品。《广西通志稿》也记载其“成为向各级官员馈赠的珍品”。贡品地位的确立, 极大地提升了凌云白毫茶的声誉与经济价值, 使其不仅在宫廷与官场流通, 也进一步刺激了茶叶生产与民间市场的发展。

2.3. 二十世纪前期: 形成稳定的种植体系与产区

20世纪20至30年代,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茶叶贸易也随之发展。其商品化路径清晰, 主要销往区域中心城市。1930年代《凌云县志》指出, 白毛茶“玉洪乡产出颇多, 运销邕色, 可称特产”([21]: 经济篇)。“邕”指邕州, 即今南宁; “色”即百色。这表明至清朝中后期, 凌云白毫茶已建立起稳定的区域贸易, 作为地方特产销往百色周边城市。

相比清朝, 此时的百色茶叶发展呈现出产业的扩大化。一方面, 茶园面积持续增加, 茶叶在地方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各县志中对此有具体记载, 如《田西县志》详细描述了浪平乡白毛茶的种植、施肥、采摘与加工方法——“春时栽种珞施畜粪, 长成后每年摘叶两次, 旧历六月为第一次, 三月为第二次, 将叶晒干……”, 并注明其“行销附近各乡”[22]。种植统计亦开始出现, 数据显示1960年前, 仅西林县古障镇一地茶园面积即达约10,000亩, 反映了生产的规模。

3. 百色茶叶在社会生活与文化中的角色

茶叶在百色地区的发展, 不仅是一部作物栽培与贸易的经济史, 更是一部深刻融入地方社会与多民族日常生活的文化史。自清朝至二十世纪前期, 随着茶叶的稳定生产与流通, 与之相关的饮茶习俗、社交礼仪与文化象征意义, 在汉、壮、瑶等多民族聚居的百色社会生活中逐渐沉淀、定型并日益丰富。本章主要依据地方志中的“风俗”、“礼仪”、“物产”、“方言”等记载, 从主流礼仪与民族融合两个方面, 勾勒这一时期茶文化在地方社会中的形态及其文化融合。

3.1. 茶在日常社会礼仪中的角色

在清至二十世纪初的百色社会, 茶已超越单纯的饮品范畴, 成为一套规约社会关系、承载礼仪功能的文化符号, 广泛渗透于待客、婚聘、祭祀等关键生活场景之中。

待客礼仪: 茶在正式社交场合中扮演着区分礼遇、规范秩序的角色。清代《镇安府志》记载了地方官员接见土司时的礼仪差异: 通常“不给坐, 不待茶”, 而受优待者则能“给坐, 待茶, 使列坐於眾土官之上”([20]: 艺文志篇)。这一“待茶”与“不给茶”的对比, 清晰表明“奉茶”已成为官方礼仪中表达尊重与优待的重要环节, 是社会等级与礼节的一种物质体现。

提亲聘礼: 茶叶被纳入传统婚姻礼俗的“聘礼”体系, 成为缔结婚姻契约的必备之物。据《镇安府志》记载, 当地“行聘用槟榔、盐、茶、米、花、油、圆、猪、鸡, 聘礼称家贫富”([20]: 风俗篇)。在此, 茶叶与象征生活基本需求的盐、米、油以及象征吉庆的槟榔、家畜并列, 构成了聘礼的核心组成部分。至二十世纪初, 这一习俗依然延续, 《凌云县志》中仍有“婿家备酒肉白米各百二十斤, 盐茶槟榔姜叶每……”([21]: 风俗篇)的记载。茶在婚俗中的固定地位, 反映了其已经不只是寻常饮品, 而是一种具有文化意象的物产, 被赋予祝福新人未来家庭生活美满、礼仪完备的象征意义。

祭祀祈福: 在祭祀祖先、天地及年节祈福等民间信仰场合, “烹茶”、“煮茗”是不可或缺的仪式环

节。清代方志描述元旦祭祀场景为：“烹茶、点香烛、列油团、米花、粽糍、果蔬、酒馐，拜天地祖先父母”([23]: 风俗篇)。二十世纪初期《凌云县志》也记载了类似习俗：“元旦皆陈香茗糕稷蔬渠焚香烛”([21]: 风俗篇)，以及祭灶时“各家焚香煮茗，具素肴糖果以祭”([21]: 风俗篇)。在这些庄重的仪式中，茶与香烛、酒馐、糕点等祭品同列，有了一定的民间信仰属性，成为表达先民文化心理的、虔诚的媒介，其文化功能从世俗生活延伸至精神信仰领域。。

3.2. 茶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本土化融合

百色地区多民族杂居，茶文化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长期互动中，不仅被普遍接受，更在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本土化印记，体现出从主流礼仪向民族生活的延伸与交融。

方言称谓的多样性。地方志中特意记载的不同民族或族群对“茶”的方言称谓，是茶文化深度地方化与普及化的直接证据。清《镇安府志》中录有“茶，曰甲”、“喫茶，曰罐茶”或“喫茶，曰跟查”等音译记录([23]: 风俗篇)。二十世纪初《凌云县志》的“人口”部分，系统收录了本地“土音”，其中“喝茶”在不同记录中分别被记为“更霞”、“合甲”、“胡杂”、“喫吉”、“合襟”等([21]: 人口篇)。这些纷繁多样的音译词汇，生动证明了饮茶行为已深深嵌入当地各社群的语言体系，成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日常生活的“刚需”化。茶不仅存在于特殊礼仪中，更深植于日常。方志编纂者观察到，“喝茶”一词能与“吃饭”、“出门”等基础生活用语并列于方言对照表中，此现象侧面印证了饮茶已如同吃饭一般，成为各民族居民日常生活中一项稳定且普遍的习惯。这种“日常化”意味着茶叶的消费已跨越民族与阶层，构成了该区域一种共同的生活文化底色。

综上，通过对地方志史料的梳理可见，自清朝至二十世纪初，茶叶在百色地区已构建起一个从民间信仰到世俗婚姻、从官方礼仪到日常家居、跨越民族界线的文化网络。茶文化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这一物质载体被不断赋予社会意义、融合进地方风俗，并促进多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过程。

4. 百色历史中的茶叶税收与贸易

茶叶作为经济作物，其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通过贸易记录与市场价格得以体现。清代文献中保留的税收记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茶叶贸易的规模。光绪《镇安府志》载有赋役改革内容：“所有猪马油酒茶纸鱼桥及催户各名色，永远禁革”，规定此后田地统一缴纳粮银[23]。这条史料表明，在此之前“茶”曾与猪、马、油、酒、纸等并列，是地方经济活动中的常见交易品类。其被纳入统一的赋役管理体系，说明茶叶贸易或生产已达到一定规模，成为地方经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贸易范围上，凌云白毫茶销往周边城市在《凌云县志》《田西县志》等方志中均有记载：“运销邕色”([21]: 经济篇)、“行销附近各乡”([22]: 产业篇)。在1920至1930年代，凌云白毫茶不仅销往广东等省份，更是逐步扩展到国际市场。关于凌云白毫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商品化程度，目前所见有三份关键史料，分别从产地价格、销地价格与海外市场地位三个层面提供了重要信息。

1929年中山大学农科学院的调查显示，上等白毛茶在广东市场售价“每斤约一元二毫”[24]，同期黄糖每百斤约十二元、鸡每斤四五毫、普通蔬菜每斤五仙。以大米价格估算，一斤上等白毛茶约可换取15~24斤大米，足见其在当时已属高价值经济作物。1934年的《广西凌云县主要物品价格表》则记录了产地市场的价格——每斤0.35元[25]。当然，其中可能包含上等品质茶叶与产地通货的差价，及从1929至1934五年间的价格波动。但从产地到销地，价格上涨约3.4倍，可以推测这一价差容纳了运输、包装及商业利润等多项成本，反映了茶叶在流通过程中的价值增值。至1935年，凌云白毫茶在新加坡国货展览会上与福建武夷茶、文圃茶并列“铭茶”，被誉为“各茶位中之最高者”[26]。证实凌云白毫茶从桂西

山区走向了国际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 1935年新加坡文献详细记载了白毛茶出口包装工艺: 木箱内衬锡板、外贴商标、外加竹笼, 每箱包装成本合计“一元六角”[26]。按每箱可装茶叶数十斤计算, 包装成本分摊到每斤茶叶约合0.03~0.05元, 在产地至销地的0.85元价差中占比不足6%。这意味着, 凌云白毫茶的贸易利润主要来自茶叶本身的高附加值, 而非简单的成本转嫁。这也解释了为何产地价格较低的白毛茶, 能够在海外市场获得顶级名茶的地位——其核心价值在于茶叶品质本身, 而非依赖低价竞争。

综上所述, 百色茶叶从早期的实物交易对象, 成长为融入地方乃至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商品。这一渐进的演进过程, 共同构成了凌云白毫茶作为一项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历程。

5. 结论

本研究以明清至二十世纪前期的地方志为核心史料, 结合现代调查文献, 对广西百色地区茶叶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梳理。通过对《镇安府志》《凌云县志》《广西通志》及《田西县志》等方志中共57条相关记载进行系统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基于史料的结论:

第一, 百色茶叶的产业发展脉络清晰, 呈现阶梯式上升。史料表明, 其起源可明确追溯至明朝弘治年间, 凌云县出现了有文献记载的首次人工茶园开辟活动。至清朝, 记载趋于丰富, 凌云白毫茶不仅形成了稳定产区, 更在乾隆时期成为上贡京师的“方物”, 实现了从地方作物到贡品的身份跃升, 其贸易网络也扩展至“邕色”地区。进入二十世纪, 方志中对茶园面积、种植管理、商品流通的记载更为具体细致, 标志着产业进入规模化、商品化新阶段, 并为其后在二十世纪中叶被国家认定为优良品种奠定了产业基础。

第二, 茶文化深度融入地方社会结构与多民族日常生活, 其社会功能被史料具体记录。清代方志详实记载了茶叶在三种核心社会礼仪中的固定角色: 在官方与社交场合, “待茶”与是否是区分礼遇尊卑的仪式; 在人生仪礼中, 茶是“行聘”必备的聘礼之一, 与盐、米等生活必需品同列; 在民间信仰领域, “烹茶”、“煮茗”是元旦、祭灶等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祭品。与此同时, 二十世纪方志中记录的多种少数民族方言对“茶”与“喝茶”的不同称谓, 以及饮茶与日常核心词汇的并列, 确证了饮茶习俗已超越族群界限, 成为当地一种普遍的生活习惯。

综上, 史料所呈现的百色茶叶史, 是一部物质生产与社会文化相互交织的地方史。凌云白毫茶不仅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经历了从发现、利用到贡赋、贸易的发展过程; 更作为一种文化载体, 系统地参与了地方社会礼仪的构建、民族日常生活的融合, 成为观察该地区明清以来社会秩序、经济生活与文化交融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切面。本研究通过对此过程基于史料的复原, 为理解中国边疆地区物质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提供了详实的个案。

参考文献

- [1] (唐)陆羽. 茶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1.
- [2] 格勒.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J]. 西藏研究, 2002(3): 59-64.
- [3] 任新建. 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J]. 中华文化论坛, 2008(S2): 53-55.
- [4] 石硕. 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 西藏研究, 2002(4): 49-57.
- [5] 张永国. 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J]. 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 2006(2): 34-40.
- [6] 陈保亚. 论茶马古道的起源[J]. 思想战线, 2004(4): 44-50.
- [7] 张海超. 南诏大理国与吐蕃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贸易初探[J]. 农业考古, 2020(2): 110-117.
- [8] 广西茶马古道——德保古道[J]. 西部交通科技, 2009(8): 129-130.

- [9] 李民. 历史时期广西茶业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0.
- [10] 蒋文中, 仇学琴, 龙翔. 论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茶文化交流与和谐之美[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0, 25(1): 95-102.
- [11] 赵澗恋. 中国少数民族茶文化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 [12] 刘礼堂, 冯新悦. “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研究: 回顾、反思与展望[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75(3): 77-84.
- [13] 刘礼堂. 西南茶马古道视域下的藏彝走廊民族关系探析[J]. 江汉论坛, 2024(11): 101-107.
- [14] 陶德臣. 论清代茶叶对外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J]. 农业考古, 2024(2): 49-58.
- [15] 康健. 祁门红茶源流考[J]. 中国农史, 2024, 43(3): 80-96.
- [16] 苏仕林, 张婷婷, 马博, 等. 百色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植物学研究[J]. 安徽农学通报, 2011, 17(23): 123-124, 142.
- [17] 苏锦兴, 苏孔武, 黎金兰. 凌云——广西最大的产茶县[J]. 广东茶业, 2005(6): 7-8.
- [18] (清)王維准, 纂修. 西林縣志(康熙) [M]. 公餘偶, 吟. 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 [19] (清)谢启昆, 修. (清)胡虔, 纂. 广西通志[M]. 卷三十一. 嘉庆.
- [20] (清)傅堅. 镇安府志[乾隆] [M].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 [21] 蒙启光, 修. 林其椿, 纂. 凌云县志[M]. 一九四二年刊本.
- [22] 叶鸣平, 罗建邦, 修. 岑启沃, 纂. 田西县志[M]. 八编一九三八年刊本.
- [23] (清)羊复礼. 镇安府志[光绪] [M]. 清光绪十七年修.
- [24] 钟桃.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M]. 丁颖, 廖迪雍, 校. 林纯煦, 卓正丰, 陈干济, 等, 调查. 广州: 中山大学农科学院, 1929.
- [25] 广西各县概况[M]. 南宁: 南宁大成印书馆, 1934.
- [26] 新嘉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M]. 新加坡: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文书股, 1935.